

● 比较政治

制度变迁与战后美国南部的崛起^{*}

王 崇 兴

(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 浙江 宁波 315100)

[作者简介] 王崇兴(1971-), 男, 黑龙江五常人, 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美国南部史和美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摘 要] 南部的崛起是美国在 20 世纪所发生的最重大的社会变迁之一, 为多方所关注。“唯华府论”、“唯市场论”和“南部地理优势论”等观点对其成因的解释, 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历史地看, 南部的崛起并不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区域平衡发展计划或市场自律的产物, 而是“大萧条”以来各种内外因素互动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外因是打破南部社会传统机制的关键力量, 而内因则是推动南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外因的诱导和内因的主导的复杂而有机的结合所导致的制度变迁, 是促使战后南部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 作为历史上美国的落后地区, 南部的崛起可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提供资鉴。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和美国的西进运动不宜进行比较。

[关键词] 美国南部; 制度变迁; 崛起

[中图分类号] D 5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99(2002)05-0610-08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南部是美国第一位的经济问题^[1] (P. 33), 是美国的边缘地带。但新政以后,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南部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作为美国阳光地带(Sunbelt)的核心部分而为世人瞩目。南部的崛起是南部社会本身的一次巨变,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自内战以来北富南穷的区域发展失衡的状况, 对促进美国的地域整合、社会整合及其国内市场的扩大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宏观的层面探讨制度变迁如何打破南部社会原有的利益格局, 如何促使南部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变化, 从而系统阐释南部崛起的原因和南部社会发展的特殊历程。

一、对几种观点的商榷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南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结构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学者、政府官员和时事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和思索。对于南部崛起的成因, 他们给出了不同解释。加温·赖特曾对众说纷纭的观点加以总结。他指出, 关于南部崛起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南部的经济增长是二战以来联邦政府支出, 特别是有利于南部的国防费用的支出的结果; 第二种观点主张南部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资本和劳动力向利润回报率高的地区的自然流动; 第三种观点强调作为阳光地带的主要组成部分, 南部的繁荣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居住环境新要求的反映, 体现出气候和

其他宜人的生活福利措施在人们心目中不断提升的重要性；第四种观点则认为，南部的崛起是由于南部自身相对缺少强大的工会势力、根深蒂固的官僚制、严格的立法和其他成熟经济所无法避免的“动脉硬化综合症”（Overall Hardening-of-the-arteries），“清白的历史”（Clean Slate）为南部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和迟发的优势^[2]（P.239）。

毋庸置疑，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南部的崛起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然而，这些观点皆未完整阐述导致南部崛起的诸多复杂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又都有失偏颇。笔者将第一种观点称作唯华府论。这种观点片面强调联邦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南部崛起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强调南部的崛起是联邦政府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制向北部制造业带掠取财富，将资金投向南部的结果^[3]（第74页）。这实际上是北部制造业带的人们和一部分学者基于地域偏见对二战以来美国国内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误断。早在1938年，美国政府就已充分认识到南部的落后状况和由此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但由于受制于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制定出平衡国内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没有为南部诸多落后地区投资提供联邦税收优惠政策。就广受争议的联邦资金流转问题来说，北部制造业带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一直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受益者，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其经济状况的正常反映，而不是对它的掠夺。新政以来，联邦的田纳西河流域项目、跨州公路网建设和向贫困宣战等政策措施，无疑为南部注入了大量无附加条件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了南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除国防项目所得的联邦资金份额与其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持平外，南部在其他方面所得联邦资金并不多于其他地域^[4]（P.33-41）。因此，仅从联邦财税政策和资金流向而得出南部的崛起主要得益于联邦政府的结论，是不妥当的。

第二种观点主张南部的崛起是私人资本回应市场自律机制的结果，笔者称之为唯市场论。以沃尔特·W.罗斯托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涓滴效应和传播效应最终会超过极化效应而使各地区间的经济增长状况趋于平衡。他们认为，“美国主要区域间的变化只受到了联邦税收平衡机制和支出流向的边际性影响”^[5]（P.96）。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然流向利润回报率高的地区的长期累积性的发展，最终促成了南部的经济起飞。毋庸置疑，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联邦政府很少建立改善区域差异的有效制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初期，美国保持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以实现充分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旨趣的历届政府，有足够的财力但却未有意识地去制定系统的法令和政策来达到区域平衡，因而在这一时期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对“落后地区的全方位的经济调控”，不存在“立足于稳定全局、促进全国经济增长、优化全国市场运转基础上的宏观调控行为”^[6]（第194页）。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政府在南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虚置的或负面的。唯市场论强调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警惕。私有产权制的确立是对个人或集体正当劳动成果的认可和尊重，也是人类为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发挥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一大发明。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效应，因此，主张政府尽可能少的以经济运营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这也无可厚非。但该理论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准则：市场的功效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具体规则的性质^[7]（第290页）。美国由一隅之邦迅速发展成今日世界的超级大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各级政府不仅为私人资本的发展保驾护航，而且也对私人资本的逐利行为通过法律手段予以调控和监督，通过渐进的变革对竞争加以规划，从而避免不正当竞争、恶性垄断和社会的严重不公。因此，将南部崛起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简单地归因于起伏不定的市场现象，而忽视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的作用，与上文论及的唯华府论一样都是不适当的。

就南部来说，由于缺少相应的法律调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外部私人资本的渗入，非但未能促进南部工业化，反倒巩固了南部传统势力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控制，加速了南部在整个国家中边缘化地位的形成^[8]（P.2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包括外资在内的私人资本之大量涌入确实促进了南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但从根本上讲，私人资本投资的增长是对南部出现赚取利润机会的回应，是对南部经济业已快速增长的回应。从这一角度讲，私人资本尽管是构成南部崛起的重要因素和一大助推器，却非核心动力所

在。它无法回答二战以来南部经济何以能够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它本身又如何从南部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转变成助推器的。

赖特所提及的第三、四种观点实际上可归结为一点,即认为南部本身的优势是南部崛起的关键所在。南部的地理和气候优势古已有之。但自美国独立以来,却很少有外来移民光顾此地欣赏自然美景。相反,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南部一直是美国的人口净流出地,大量的优秀人才不得不到北部诸地谋生,求得发展。7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出现南移浪潮,这一方面与空调的发明有关,但更关键的是,人口流动与私人资本一样,是一种逐利行为,反映了南部业已改善了的社会经济环境。应该指出,人口南移扩展了南部的区域市场,人才的涌入推动了南部的经济发展,促进了南部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尽管如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是导致南部经济起飞和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所谓“清白的历史”,即强调南部在自然资源、工业化、税收和政府行为等方面与制造业带相比所具有的优势。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是二战后南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主要卖点,是导致南部崛起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也是自 1877 年重建结束以来,南部主张工业化的人士对外宣传的主要内容。但为什么这些优势在当时未能使南部的工业化步伐跟上美国主流社会的经济发展进程,即它们为什么只表现为迟发的优势,而不是源发的优势?

二、制度变迁是战后南部崛起的基本动因

如此说来,联邦资金的注入、私人资本的涌入和南部本身优势的发挥都是促进二战后南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所在,但单独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全面阐释导致南部崛起的基本动因。更重要的是,正如赖特所指出的,这些观点都缺乏对南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背景的必要的考察^[2](P. 240),它们不能解释联邦资金何以能够进入长期以来对联邦政府持怀疑和敌对态度的南部以及笔者在前文提出的其他问题,因而实际上对南部崛起的根本原因并没有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

探究南部崛起的根本成因,分析包括联邦政府和私人资本等外部力量与南部本身早已具备的条件如何成为了南部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等问题,笔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南部特殊的工业化历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后认为,二战后南部的崛起是大萧条以来在外因诱导和内因主导下南部社会制度变迁的结果。即南部的变革只能通过“来自外部的、源于现代精神的力量战胜从历史上承继下来的反对任何形式变革的南部本土的民众精神”^[9](P. 691),只有通过联邦政府的积极介入才能展开,但它的经济在起飞和迅速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州、地方政府和一部分个人在宏观经济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迟发优势积极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吸引外资和促进本地企业的快速发展。

制度(Institution)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10](第 225-226 页)。它既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宏观的社会经济体系(Regime)的内容,维持社会日常运作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经济主体间合作与竞争的规则等正式约束,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和生活习俗等非正式约束。简单地讲,所谓制度变迁,是指通过暴力或渐进的方式所导致的国家性质的改变、政府的更迭、法律和有关规则的建立、变更和废止以及观念和习俗的变化。历史地看,渐进的变革是实现制度变迁的主要路径。

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二者相互影响,互相促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技术创新是具有理性的人类不断累积知识的自然结果,但技术创新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并不是文明社会的常态,而是以政治民主、自由竞争、法律化、理性化、精细化和规范化为主要内容、以形式合理性和开放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制度确立的产物。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合理的制度化建设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因此,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一个能够提供稳定预期,确保个性自由、明晰产权和维护基本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是更为重要的。

南部特殊制度的形成和巩固是它不断走向落后的一个过程。这一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于旧南部时

期,它以优越的自然和土地条件及宽松的人地关系为物质前提,以农业生产方式为经济基础,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价值取向,并杂糅了边疆拓殖精神、白人至上、种族奴役和欧洲传统贵族生活习气等内容。该制度体系在经历了以摧毁它为直接目的的残酷的内战和强制性重建后,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奴隶成为自由人;奴隶制种植园转变为实行租佃谷物分成制和留置权制的农场;昂贵的奴隶交易让位于廉价的劳动力市场;种族隔离取代赤裸裸的种族奴役。但是,由于内战和重建没有进行确保自由所必须的土地和其他经济方面的改革,多数内战前的大奴隶主在转变为农场主后,继续控制着南部的大部分土地。“1860年在亚拉巴马黑人聚居地带的236位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到1870年时,其中的43%仍然是当地拥有土地的精英。在1860到1870年间,黑人聚居地带最富有的10%的种植园主所拥有的不动产份额由55%上升到63%”^[11](P.9-16)。正如埃里克·方纳所指出的:“内战并不意味着旧种植园主阶级权力的跌落和一个新兴的企业家精英的掌权。对南部社区史的研究表明,种植园主在经历内战后仍生存下来。他们拥有的土地和社会声望几乎完好无损”^[12](第199页)。南部的经济运行方式虽也发生了变化,但农业作为南部经济基础这一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同时,南部传统型的政治文化在实质上也没有发生断裂和转向,相反却在同北部争夺联邦控制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内战和重建结束后,“扬基佬留给南部的是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但却仍然是古老的第一原则岿然未动的世界:是一个黑人仍处于泥沼之中,白人,乃至每一个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人的世界。总体来说,并从其基本特质来看,重建远未重建南部的精神”^[13](P.107)。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一种前资本主义的政治观,认同等级制社会,期望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处于上层的人们在政府和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强调共和制下的家长制和精英理念。它虽然承认政府在地方事务中应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总是设法将这种作用限定在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层面,真正的政治权力往往掌握在人数相对较少和比较固定的统治精英手中,他们大多通过家庭纽带或特有的社会地位传承着统治权。因此,在传统型的政治文化中,家庭和社会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竞争通常表现为派系纷争,政党的作用被弱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政治活动中为个人和同类捞取好处,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是为了推进社会公益和社会发展^[14](P.99)。南部旧时的统治阶级,主要是黑人聚居地带^①的大农场主。正是利用南部普通白人对上述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利用他们对黑人的蔑视和对北部人及联邦政府的仇视,采用暴力和欺骗等手段在重建后重新控制了南部,并同外来的投资者相互利用,将南部推向边缘化境地。

内战和重建结束后,虽然南部州权主义势力遭到失败,美国国家主义理念未再受直接挑战,但联邦政府也很少再直接过问南部事务,南部旧有的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南部的统治者得以利用他们在全国民主党中的优势地位和国会中的资格制使南部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自由地处理南部的内部事务”^[15](P.587)。在奴隶制被废除后,南部社会运行于以租佃谷物分成制、民主党一党控制和种族隔离制为主要支柱的新框架中,走上了一条劳工控制型和依附型的工业化道路。新政前的南部制度体系既不能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更没有提供一个个人激励机制,从而使对社会发展十分重要的技术创新和观念创新失去了应有的环境和土壤。

因此,从表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部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可以归因于本地区的资本匮乏、劳动力素质低下和缺少创新型人才。但从根本上讲,这一切与其说是导致落后的原因,毋宁说是落后的具体表现。南部统治阶级推行的旨在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秩序的落后制度才是病灶所在。南部白人封闭保守和防御性的社会心理,使南部自身无法实现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因而也就失去了自我变革和发展的能力。

虽然重建后的南部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作为美国的一个区域,它必然受到联邦政府在关税、货币和有关州际贸易等方面法律法规的限制。因此,南部的落后,南部的边缘化,客观上也与当时美国制度体系的运作不无关联。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集团间的纷争。重建结束后,南部的政治势力遭到严重削弱,控制着联邦政府的北部资产阶级只关注自身的资

本积累和海外扩张,在关税、铁路运价等方面实行有损于南部的政策,并通过在外业主所有制等方式对南部的工业发展加以控制,使本就基础薄弱的南部经济处于十分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中。

大萧条所造成的灾难性形势,为包括美国南部在内的整个国家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变迁创造了条件。在联邦层面,联邦行政权力得到加强,区域纷争所主导的联邦政治有所改观,广大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利益开始受到关注。在南部,当地的统治者不得不接受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财政援助,从而为联邦政府提供了向南部施加影响的途径。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讲,新政对南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客观上满足了大农场主在危机时期的需求、要求和得到他们支持的条件下,联邦政府的《农业调整法》和《土壤保护和国内分配法》等法律的实施在南部引发了一场农业革命。重建以来一直是南部社会经济基础的租佃谷物分成制逐步瓦解,农业机械化迅速推广,从而推动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发展。《全国工业复兴法》、《瓦格纳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等法律的出台,也大大改变了南部工业领域中的低工资制,南部劳工控制型体制开始解体,一种新的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在悄然形成;二是虽然罗斯福在直接与南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没能实现预定的目的,但他却成功地使民主党摆脱了南部白人的控制,创建了民主党新的选举联盟,并使民主党主流派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主张,为从外部强制性地改变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和寡头政治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民主党失去南部和共和党在当地的复兴做了铺垫。三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立和切实运作不仅在当时缓解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电力的生产和输送,为该区域乃至整个南部的工业化提供了能源基础。托马斯·D. 克拉克在评价《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时指出:“这是一个新政早期的立法。对南部来说,它是工业与社会革命的开始。在许多方面,它都可以说是由国会制定的广泛的公共立法中最为非凡的一个。确切地说,南部经济与社会史可以以此法的通过为界标。”^[16] (P. 131)从田纳西河流域各工程对南部的贡献和影响来说,克拉克的观点并非夸张。可以说,大萧条和新政是南部现代性社会形成的开端,是南部脱离传统社会,为起飞做准备的一个阶段。

打破了制度瓶颈的南部经济,以二战为契机,实现了起飞。战争期间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南部的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联邦和私人资金的注入以及军人和技术人员的移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部资金和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大批黑人北迁,则减缓了南部白人对种族问题的担忧。战后在各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南部经济得到继续发展。联邦政府继续向南部提供资金,但是由于各区域和南部各州之间对联邦资金的争夺,联邦资金起到的只是一种导向性作用。因此,各州为促进本州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各项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南部各州和地方政府及南部的国会议员在积极争取联邦资金的同时,为吸引外资和鼓励新建企业,在税收^[17] (第 217 页)、财政补贴、职业技术培训、控制工会运动等方面大做文章^[18] (P. 59, 62),营造良好的商业氛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南部成为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的首选地,国内也出现了资金和人口南迁的潮流。

应该指出的是,南部的经济增长并不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同步。主动地寻求经济增长和被动地进行政治与社会变革是南部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南部经济的增长并未能解决种族问题。相反,随着黑人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组织的不断完善,领导人素质的提高,他们逐步通过以非暴力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民权运动,要求平等公民权、平等人格尊严和更多经济机会,而南部政客、一部分工商业者和广大普通白人对种族隔离制则顽固持守,双方的斗争使南部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严重影响了南部经济的更快发展。所以,南部经济真正快速发展是开始于南部白人被迫象征性地放弃种族隔离制,民权运动被纳入宪政轨道之后^[19] (第 62 页)。因此,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无法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的;而作为社会控制系统的政治体系如不能适时地进行自我变革,不能提供基本的社会公正,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民权运动不仅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斗争,从更深刻的层面讲,也是工业化所引发的南部新兴势力与南部传统地方寡头势力之间争夺南部社会控制权的斗争。西里尔·布莱克曾指出:“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变”,不经历“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

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20] (第88, 95页), 社会往往会陷于剧烈的斗争之中, 经济与社会的真正发展与社会整合就将难以实现。就南部来说, 民权运动的结束标志着南部传统势力的衰败, 标志着南部社会的控制权由县城帮向大城市中上层阶级转移的最终完成^[21] (P. 405), 现代型领导开始主导南部的社会经济事务。南部社会实现了新旧领导层的交替, 从而为南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整合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三、“西部大开发”和“西进运动”不宜相比

1999年以来, 西部大开发渐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关注点。举全国之力再造一个山川秀美、人民富裕的新西部, 无疑是巩固并扩大改革开放成果, 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地位的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决策。西部大开发面临着诸多困难, 同时也拥有着难得的迟发优势。集思广益, 以海纳百川之恢弘气势和开放态度, 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我国东部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宏观决策和具体运作便拥有了更为丰厚和宝贵的知识资源。

借鉴需要比较, 而这要求用于比较的客体间应该具有相近的特点。错位比较往往是隔靴搔痒, 于事无补。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 国内一些学者将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拿来作为参照物, 希望从美国100余年的西部开发中寻求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22] (第263-285页)^[23] (第420-423, 429-438页)。但美国的西进运动和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实际上并不存在可比性。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西部是一个动态的地理概念, 可以说除原英属13个殖民地以外的今天美国本土的所有地区, 历史上都被称做西部。而我们中国的西部是指一个相对固定的行政区域, 大体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重庆等在内的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同时, 美国的西进运动是向荒野的进军, 是对充裕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是一次按照人的意志对自然的征服, 是在开发中逐步确立新型的生产关系、生产布局、产业结构和城乡分布。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则是一次对古老社会的重建, 是恢复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 是在改革现有生产关系、生产布局、产业结构和城乡分布的基础上进行的开发。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不是随心所欲地对自然索取, 相反, 它首先要向久存的生态灾难投资; 更为重要的是, 西进运动时期的美国西部并不是美国的落后地区。有的学者似乎也认识到了简单地将中美的西部进行对位比较的困境, 而将新政以来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开发、阿巴拉契亚山区开发都归为美国的西部开发。毋庸置疑, 这是不适当的, 因为上述两个地区都属于美国的南部区域。

因此, 欲从美国落后地区的发展中吸取营养, 我们应将目光投向美国的南部。二战前的南部, “无论从任何社会经济指数来看, 都是美国最落后贫困的区域”^[21] (P. 1)。当时的美国南部与今天的中国西部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 两个地区都是各自所在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经济结构不合理, 农业和初级加工业主导着当地经济。其次, 这两个地区都存在着人力资源匮乏、教育水平低和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第三, 这两个地区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尽管我国西部的情况要比当年美国南部的情况严重得多。最后, 这两个地区在各自国家中的边缘地位的形成, 固然与两个国家中央(联邦)政府采取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有关^②, 但更关键的症结则在于各自所承载的沉重历史负担、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

历史地看, 美国南部在二战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首先得益于新政以来在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下对传统经济结构——租佃谷物分成制——的成功改造, 特别是二战以来包括军工企业在内的新型工业企业在南部的建立和发展。因此, 对我国西部来说, 中央政府如何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加速西部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促进新兴工业在西部的的发展, 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美国南部崛起过程中, 联邦政府在改善南部的生态条件、改进南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南部政治变革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20多年里, 对南部工业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却监管不利。在我国西部开发过程中, 为可持续发展计, 中央政府必须在治理环境、惩治污染

方面采取集中管理措施。

同时,当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建立之初,董事会成员带领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的工作队深入该流域腹地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田纳西河流域后来的发展不能说不得益于专家们对基层和田野的切身体验。我国西部大开发中高度重视专家学者的智识、见解和经验,许多专家和学者也提出了真知灼见。但对参与西部大开发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专家和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时专家们的做法,走出书斋,少去出国考察,真正走进西部。宏观的论述固然不可或缺^③,但当下也许更需要的是对西部的碎化研究,掌握西部各地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两国在国家制度和传统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我国落后地区开发的过程中,关于如何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又不宜照搬美国的经验。美国南部的崛起是在联邦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逐步推进的,但联邦政府对南部事务的介入仍然十分有限,所起的作用也是导向性的和基础性的。从根本上讲,南部的崛起主要是州和地方政府行为。而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和地方政府,都不是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而主要依靠财税政策、提高劳动力素质等方式对经济发展给予扶助。

在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决策方面严重依赖中央,自主发展能力相对较差。因此,西部大开发在发挥中央政府宣传、督导功能的同时,必须使西部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自主行为。中央政府在加大对西部的基础建设投资的同时,也应该逐步退出对西部具体经济活动的参与,发挥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

应该说,在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持下,西部大开发的外部环境非常有利。但正如美国南部由黑暗地带发展成为阳光地带经历了几十年的时间一样,西部大开发也很难一蹴而就。大开发不是“大跃进”,它要求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要有耐心,在憧憬伟大目标的同时,更要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下足功夫。

注 释:

- ① 参见 Arthur F. Raper: Preface to Peasantry——A Tale of Two Black Belt Counties (New York: Atheneum, 1968)。黑人聚居地带指处于南部核心地带的黑人人口超过一半的大约 200 个县。它们位于从弗吉尼亚到得克萨斯的新月带,那里曾是奴隶制种植园所在地,也是其后大种植园的所在地。那里是土壤最肥沃而人民最贫穷的地区,是民主党控制最严密而最少民主的地区。
- ② 在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制定过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计划。新政前,联邦政府主要受制于北部资本利益集团,在政策上明显有利于北部,使联邦政策在客观上表现为区域非均衡发展。在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政策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集中体现。
- ③ 参见杨秋宝:《西部开发如何走出传统发展模式》,载《光明日报》2000 年 6 月 16 日;傅桃生编著:《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考》,中国水利电力出版社 2000 年版。

[参 考 文 献]

- [1] COBB, James C. & NAMORATO, Michael V. The New Deal and the South[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4.
- [2] WRIGHT, Gavin.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M].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86.
- [3] [美]柯克帕特里克·塞尔. 权势转移—南部边缘地带的兴起及其对东部统治集团的挑战[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 [4] WEINSEIN, Bernard L. & FIRESTINE, Robert E. Regional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e of the Sunbel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ortheast[M].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8.
- [5] ROSTOW, Walt W. Regional Change in the Fifth Kondratieff Upswing[A]. The Rise of the Sunbelt Cities[C]. Beverly Hills: Sage, 1977.

- [6] 白景明. 美国—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1994.
- [7] [英]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 上[M]. 邓正来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 [8] COBB, James C.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uthern Society: 1877-1984*[M].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4.
- [9] COBB, James C. Does Mind No Longer Matter? The South, the Nation, and The Mind of the South, 1941-1991[J].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91, 57(4).
- [10] [美] 道格拉斯·C·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 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WIENER, Jonathan M. *The Origin of the New South, Alabama, 1860-1885*[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12] [美] 埃里克·方纳, 等. 新美国历史[M]. 齐文颖, 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13] CASH, W. J. *The Mind of the South*[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2.
- [14] ELAZAR, Daniel J. *American Federalism—A View from the States*[M].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2.
- [15] FONER, Eric. *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1863 \ | 1877*[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 [16] CLARK, Thomas D. *The South Since Reconstruction*[M].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 [17] 章嘉琳. 变化中的美国经济[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6.
- [18] NEWMAN, Robert J. *Growth in the American South—Changing Reg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 Patterns in the 1960s and 1970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9] 经济译丛编辑小组. 经济译丛: 第九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0] [英] 西里尔·布莱克. 现代化的动力[M]. 段小光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21] BARTLEY, Numan V. *The New South: 1945-1980—The Story of the South's Modernization*[M].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22] 高路, 葛方新. 大决策出台——西部大开发方略[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 [23] 唐荣安, 李永泰. 西部大开发——西部的资源、环境、政策和机遇[M].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叶娟丽)

Institutional Changes & Rise of American South since WW II

WANG Dong-xing

(Department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100, Zhejiang, China)

Biography: WANG Dong-xing (1971-), male, Lecturer, Doctor, Department of Culture & Communication,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American history.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South is one of the biggest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America in the 20th century. It is not the production of the plan of regional balance development carried out by the American federal government or the self-discipline of market, but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operation of various factors since Great Depression. External causes were the key force to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of American South, and internal ones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promoting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ern economy. Institutional changes are the basic factors that cause the rise of American South.

Key words: American South; institutional changes; rise